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黄俊杰 主编

黄俊杰 编

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二）：
通论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黄俊杰 主编

黄俊杰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二）：
通论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一):通论篇/黄俊杰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617 - 5879 - 3

I. 中… II. 黄… III. 儒家—文集 IV. B222.0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0158 号

本书原名《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一):通论篇》,简体版由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授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7-139 号

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一):通论篇

编者 黄俊杰
项目编辑 钟明奇
文字编辑 韩秀丽
责任校对 邱红穗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刷者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6 开
插页 2
印张 25
字数 371 千字
版次 2008 年 6 月第一版
印次 2008 年 6 月第一次
印数 5100
书号 ISBN 978 - 7 - 5617 - 5879 - 3 / B · 393
定 价 39.00 元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总 序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的出版，是近年来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中的一件大事。这套丛书所收的都是台湾大学“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相关的同仁以将近十年的时间，所撰写或编辑的有关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的书籍。借此发行简体字版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机会，我想对这套丛书的缘起与目标略作说明，以就教于读者。

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其长远的研究背景。1998年，我在当时台湾大学陈维昭校长及李嗣涔教务长（现任校长）大力支持下，规划并主持由台大所资助之“中国文化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1998-2000），整合台大文、法两学院教师近二十人，进行共同研究，获得良好成果。其后，我又负责主持“大学学术追求卓越计划”项目之一：“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2000-2004），结合台大校内、外学者专家进行研究，这项计划是当年“卓越计划”中唯一的人文领域计划。2002年起，以上述两计划为基础，我们研究团队又执行台大为“推动研究型大学整合计划”而设置之“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研究计划”（2002-2005）。经由前述三项计划之努力，终得累积丰硕之成果，陆续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印行，迄今已出版专书七十余种（仍在陆续出版中），依性质分为《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东亚文明研究资料丛刊》、《东亚文明研究书目丛刊》等三大系列。

现在我们推动中的台大“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建立在自1998年以来各阶段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以东亚为研究之视野，以儒家经典为研究

之核心，以文化为研究之脉络，既宏观中西文化交流，又聚焦东亚各地文化之互动，并在上述脉络中探讨经典与价值理念之变迁及其展望。我们希望在 21 世纪文明对话新时代中，深入发掘东亚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上推陈出新，开创新局。

为了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我们将过去将近十年来在台湾大学已出版的有关儒学的专书，编为《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发行简体字版，与更广大的中文读者见面，应有其深刻之意义。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时代里，儒学是东亚文明的主流思想，必然在文明对话的新时代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一套丛书标示着我们复兴儒学传统，弘扬中华文化理想的初步实践。我们的愿景虽然恢宏，但我们的力量却极为有限，我希望广大的读者朋友，认同我们的志业，支持我们的用心，匡助我们的不足。

最后，这一套丛书之得以出版，除了感谢台湾大学李嗣涔校长的支持之外，我在此特别要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教授和他的同事致上最诚挚的敬意与谢意。朱教授是朱子后人，对朱子学深有研究，提倡儒学研究不遗余力。朱教授主编《朱子全书》早已蜚声国内外，其有功于朱子学研究乃世所共见。朱教授大力促成《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的出版与发行，相信对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必有极大之助益。我们也希望，能为未来儒学的发展，继续共同努力。

黃俊傑 謹識

2007 年 4 月 13 日
于台北台湾大学

序

《中国经典诠释传统》这套书(共三册),是在1998年8月1日至2000年12月31日这段期间,台湾大学所推动的“中国文化经典的诠释传统”研究计划的部分成果,现在趁着这套书付梓出版之际,我想说明研究计划的缘起与目标,以就教于读者。

“中国文化经典的诠释传统”这个研究计划,是“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整合型研究计划(2001-2003,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推动“大学学术追求卓越发展计划”之一)之前置性计划,是台大同仁所推动,参与的学者包括台大文学院与社会科学院专任教师,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员,以及国内外各大学对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这个课题感到兴趣的学者。在第一阶段两年的计划执行期间,我们就自己专业领域进行研究,撰写论文,共举办八次学术研讨会。所发表的论文分别送到台大、中研院、台湾中央大学各学术性期刊审查发表,再由李明辉、杨儒宾和我依论文主题及性质编辑成为三册专书。

这个研究计划的推动,主要是着眼于中国学术史上有其悠久的经典注疏传统,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从这个学术资源中,我们可以发展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诠释学。这种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诠释学,就其发生程序而言,与西方近代的诠释学颇有恍惚近似之处:两者皆起于诠释者与经典之间的主体性之“断裂”,使两者之间沟通不易,索解无由。但就其本质状态观之,则中国诠释学自有其深具中国特色之面相,值得加以发掘。从中国的经典注疏传统所见的中国诠释学,在儒、释、道各家有其互异之面貌,在文学、史

学与哲学经典中亦有其特殊之展现方式。这个研究计划针对上述中国文化中之经典诠释学这个学术领域,进行集体研究。现在所出版的这三册,是研究计划同仁在1998至2000年期间的部分研究成果。在“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从2000年1月开始推动以后,就与“中国文化中的经典诠释传统”计划同仁融为一体,齐头并进。我们希望随着研究计划的执行,陆续将研究成果编为专书,在《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刊》中陆续出版。我们感谢许多海内外朋友和先进担任本丛书的编辑顾问与编辑委员。

这个研究计划课题广泛,牵涉多方,所谓“道假众缘”,如果不是众多前辈和朋友的鼎力支持,这个研究计划实在难以启动。“起但是缘,故名缘起”(《华严金师子章·明缘起第一》),关于这个计划的缘起,我要特别感谢台大陈维昭校长和李嗣涔教务长的鼓励,他们的支持促成了“中国文化中的经典诠释传统”这个研究计划,也正是在这个计划的基础之上,我们继续扩大规模与研究范围,而有“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整合型计划的推动。其次,支持并参与本计划的国内外学者名单太长,我无法一一列举致谢,其中台大张亨教授、中央研究院刘述先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张隆溪教授、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罗格斯(Rutgers)大学涂经诒教授等,从1998年本计划开始时,就长期参与,提示意见,本计划同仁都铭感在心。此外,劳思光教授、余英时教授、戴璉璋教授、王靖宇教授、林毓生教授、孙康宜教授,都直接或间接对本计划同仁多所启导,我们衷心感谢。

本计划从1998年1月开始推动以后,同仁所撰写的论文为早日获得海内外先进的指教,而投稿刊载于下列期刊或专书:

1. 《台大历史学报》第24期《中国经典诠释》专号(1999年12月,台大历史系出版)。
2. 《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9卷第3期《中国经典诠释》专号(1999年9月,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出版)。
3. 《中国哲学》第22辑《经学今诠初编》专刊(2000年6月,北京:中国哲学编辑部出版)。
4. 《台大文史哲学报》第53期《中国经典诠释》专号(2000年12月,台

大文学院出版)。

5. 《人文学报》第 20、21 期合刊《经典诠释与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号 (2000 年 12 月,台湾中央大学出版)。
6. Ching-I Tu ed., *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s: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New Brunswick, N. 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计划同仁的论文在上述刊物发表后,均经过修订后才收到《中国经典诠释传统》这套书中,我们特别向上述期刊的编委会及专书编者敬致谢意。喜玛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的韩效忠先生和江显新先生护持中华文化不遗余力,他们发心出版这一套书,支持人文学术,我们十分感谢!

21 世纪是一个世界诸多文明对话的新世纪,但是,在文明对话之中,只有愈深入自己文化的根源的人,才能与异文化进行深入而有益的互动、对话与调融。“中国文化中的经典诠释传统”这个研究计划的立意,就是希望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的思想资源,从中国经典中开发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意识,并且从东亚知识分子长达二千年的读经解经传统中,建设具有东亚文化特色的经典诠释学。“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我们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我们现在所刊印的《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三册,只是一个小小的起步,《荀子·劝学》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弩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我们希望现在迈开的一小步,能够成为千里之旅的首途。“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楚辞·离骚》),前路方遥,纒短汲深,我们诚恳地盼望海内外学界先进的指教。

黄俊杰

序于台大历史系

2001 年 8 月 15 日

导 言

一

本书是《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第一册,收集十二篇论文与两篇学术座谈会记录,共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理论与背景》收录讨论西方诠释学的论文五篇,与回顾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论文五篇,为这一套书提供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背景。第二部分所收四篇论文都讨论中国经典诠释史所出现而具有普遍意义的课题。我想先介绍本书各篇论文的主旨,再说明各文所触及的重要课题,以作为读者阅读全书的参考。

二

第一篇论文《经典在诠释学上的意义》的作者张隆溪,现任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兼该校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是国际知名的学者,著述宏富,对中西文学诠释学之比较创获尤多。^① 张教授在本书第一篇

^① Longxi Zhang, *The Tao and the Logos: Literary Hermeneutics, East and Wes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2), 中译本:张隆溪著,陈川译:《道与逻各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Mighty Opposites: From Dichotomies to Differenc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转下页)

论文中循高达美(Hans-Georg Gadamer, 1900 -)的思路,探讨经典在诠释学上的意义。他强调,经典并不是静态不变的文本,经典并非存在于纯粹的过去,也不是与解释者无关的外在客体。因此,经典的所谓“无时间性”并不意味着它超脱历史而永恒,而是说它超越特定时间空间的局限,在长期的历史理解中几乎随时存在于当前,也就是随时作为当前有意义的事物而存在。当我们阅读一部经典著作时,我们不是去接触一个来自过去、属于过去的东西,而是把我们自己与经典所能给予我们的东西融合在一起。经典是文化传统的体现,经典的文本超越时代及其趣味的变化,所以成为现在与过去联系的最佳途径。解释者与经典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相互对话的参与式关系。张隆溪教授所提出的上述论点,值得读者开卷之际三复斯言。

张鼎国所撰的第二篇论文接着探讨经典诠释注疏中诠释的定位及其取向。张教授专攻诠释学,已发表多篇重要论文。^①张鼎国的论文的问题意识也是从高达美哲学出发。他指出:高达美为了要彰显出人的存在之历史性,而主张一切能发挥实效的理解诠释,都是一种“不同”理解。然而,这个有意冲淡诠释者主导地位的新创说法,却立即引起新一代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学者的不满,而思重返理性启蒙的基本立场,再度倡议极具积极批判与进步意识的作“较好”理解之说。张教授这篇论文分析这两种立场,反省这些不同态度的争执中,对于经典注疏工作的理论深度及自我反省的启发及其适用性。张鼎国在分析以上这两种态度之后,接着指出:哲学诠释学对经典诠释的研究工作具有两项启示:第一,所有诠释理解之活动,都不是从零点出发,而必然包含着对既有传统经典的尊重与传承,以及期望令其持续发挥实效及影响的努力。所谓“权威”除了经典本身的权威外,还有一个历代注疏随着时代的要求而建立的权威,注疏的标准则要从注疏者是否能发挥经典要

* (接上页) of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① 张鼎国:《诠释学、诠释论、诠释哲学》,《政治大学哲学学报》第4期(1997年12月),页116-142;《“书写求异”与“诠释求通”:追究一场南辕北辙的哲学对话》,《东吴哲学学报》第3期(1998年4月),页179-207;《理解,诠释与对话:从哲学诠释学的实践观点论多元主义》,收入萧高彦等编:《多元主义》(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8年),页307-335。

义,促使旧的经典展现出新时代、新处境的适用性与影响效应而论。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学统、道统与正统之争,更增强了传统归属的重要与承传的迫切性。第二,哲学诠释学主张诠释理解不是向着过去,而是针对当下并指向未来的开放发展。这种联结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取向不见得保证成功,而只是一项预期的、对于某种“完满性的前把握”而已。张鼎国认为,当代诠释学这两项基本看法,对于经典诠释工作的延续性与开创性深具启示作用。

中国的经典诠释传统所展现的是一个“生命的学问”的世界。经典诠释者经由注疏经典而企慕圣贤优入圣域,将学问的追求回向自己的身心。^①这种解经传统和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的“生命哲学”颇为神似。本书第三篇论文作者张旺山之所以探讨狄尔泰的“生命的诠释学”,就是借他山之石以为我们攻错之用。张教授尝著有专书介绍狄尔泰,^②他在这篇论文中指出:狄尔泰认为,“人”基本上是一种“心理物理的生命统一体”:心、物二者在人身上形成了一种“活生生的关连”。狄尔泰认为,最直接给予我们的东西,乃是“体验”,这些体验存在于人的一生中始终维持不变的“关连”之中。因此,狄尔泰认为,我们可以用“心理性的东西”一词指称这种关连,并以之作为进行判断与理论论述的逻辑主词。在狄尔泰哲学中,生命乃是在“人的、社会的、历史的世界”中,透过“体验—表现—理解”所界定出来的一切。“生命的客观化”就是“精神在感官世界的实现”:包括稍纵即逝的“表现”(如:表情)以及持续百年始终具有支配地位的政治体制与法典。狄尔泰大力强调:每一个个别的生命表现,都在这种“客观精神”的领域里代表了某种“共通的东西”。所谓“历史的世界”中的一切,都具有“历史性”:人就生活在历史之中!历史与生命相即相摄,不可分离。张旺山所介绍的狄尔泰的“生命的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学之“为己之学”的特质,实可互相发明。

① 参看黄俊杰:《孟学思想史论》卷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页470-482;Chun-chieh Huang, *Mencian Hermeneutics: A 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s in China*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pp. 209-272.

② 张旺山:《狄尔泰》(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

在各种类型的经典之中,宗教经典有其特殊性。本书第四篇论文作者黎志添指出:宗教经典的独特性质在于:从论述开始、成为作者的作品、以及其后脱离作者自成一独立的文本世界、直到不断与读者的心灵交会、达到新的自我理解的每一阶段过程中,宗教经典所指涉的意义和对象基本上都是面向宗教信仰者(群体)。宗教经典不单为宗教信仰者揭示所意指的神圣事物的意义,并且,更是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意义(meaning)、真理(truth)和实在(reality)。但是,从诠释学来说,由于宗教经典也是一种书写语言的论述,因此它必然和个人的宗教信仰有所不同。宗教信仰不是以语言作为主要传达的媒介或是受语言的规则所限,所以宗教信仰应算是前语言性(prelinguistic)或甚是超语言性(hyperlinguistic)的。宗教信仰的根底属于一种独特的经验,是宗教信仰者“终极的关怀”或“绝对的依靠”。但是,宗教经典却是通过书写语言(主要是宗教语言)的形式的论述(包括:诗歌、故事、神话、象征、交感和启示),以表达宗教信仰者与神圣事物相遇的经验及其对神圣事物的自我认同。宗教经典毫无疑问应该成为一个诠释学课题。

黎志添教授这篇论文以高达美与利科(Paul Ricoeur, 1913 -)的理论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互相比较,他认为不论古今中外,文本阅读与诠释都是人类普遍的经验,也因此产生了各种不同的阅读与诠释方法。黎志添引用张隆溪的看法并指出:在中国或西方的诠释历史中,存在着各种阅读方法。任何唯作者论、唯文本论或唯读者论的诠释方法,都脱离阅读和理解的实践经验。作者、文本或读者都不能成为一自足和自全的诠释单元。在这个意义下,高达美和利科二者的对谈模式的哲学诠释学的确具有深刻的价值与意义。黎志添所提出的上述观点,曾具体地展现在他对于《抱朴子内篇》的研究论著之中,^①值得研究经典诠释的学者深思。

最后,任何有关中国经典诠释的研究,可能都必须严肃地面对来自后现代主义的质疑与挑战。孟子(371 - 289? B. C.)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第四章),朱子(晦庵,

① 黎志添:《〈抱朴子内篇〉的历史处境:葛洪神仙思想的宗教社会意义》,《清华学报》新29卷第1期(1999年),页35-58。

1130 - 1200)解释孟子“以意逆志”的涵义说：^①

逆者，等待之谓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来时且须耐心等待，将来自有来时候。他未来，其心急切，又要进前寻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牵率古人言语，入做自家意中来，终无进益。

朱子的解释受到后儒的批判，德川时代(1600 - 1868)日本儒者西岛兰溪抨击朱子的解释尤其有力，他说：“心无古今，志在作者，而意在后人，由百世下，迎溯百世曰逆，非谓听彼自至也。”^②我们可以说，朱子对“以意逆志”的解释近于现代主义的立场，相对而言，西岛兰溪则探取近乎后现代主义者的立场。本书第五篇论文的主旨就是在于探讨经典诠释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本文作者王晴佳教授现任美国罗文大学(Rowan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著有专书析论中国现代史学。^③王晴佳教授在本书第五篇论文中指出：后现代的阅读经典的方式，注重的是经典的表层，并不注重经典本身的深刻内涵。换言之，从现代的阅读与诠释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对经典的一种统一而基本的理解，而是将阅读的过程开放出来，将整部经典展现出来，变成一种花园风景(landscape)，让人们(读者)随意浏览。于是，现代主义所强调的时间上的延续(经典内容的逻辑展开)，在后现代主义中就被转换成一种自由开放的空间，让人们在阅读的时候，各取所需。从重视时间到重视空间的转换，正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主要区别之一。王晴佳认为，后现代主义虽然新颖，但与古代中国人阅读经典的方式，也没有太多的差别。一般中国人对待《四书》、《五经》的态度，也常常是根据需要而选择运用适用的段落，没有多少人真正能对经典进行现代主义式的系统研究。再者，中国的经典，如《论语》、《孟子》，本身也是一个各种不同成分的综合，而非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专著，可以让后代读者各取所需。

①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卷十一，页180。

② 西岛兰溪：《读孟丛钞》，收入关仪一郎编：《日本名家四书注释全书》(东京：凤出版，1973年)，卷十三、卷九，页353 - 354，引文见页354。

③ Q. Edward Wang,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三

本书第六、七、八三篇论文，都回顾中文学术界与国际汉学界对于中国经典诠释这个领域的研究现状，为《中国经典诠释》这一套书中各篇论文提供参考学术背景。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经典及其解释作品中，《易经》居于首出之地位，皮锡瑞（鹿门，1850-1908）撰《经学通论》（刊于1907年）开宗明义就强调：“治经者当先知此经之大义。”^①熊十力（子贞，1885-1968）也有所谓“易海”一词以形容易道之渊深。台大中文系的郑吉雄^②教授在本书第六篇论文中，全面回顾了20世纪中文学术界关于《易》的研究成果，归纳为六种观点与三个时期。郑吉雄分析百年来中国学术界诠释《周易》的取向，大致上可分为以传统易学成果为基础的诠释、以科学精神为主体的诠释、以思想观念为中心的诠释等三类。他指出，以传统易学成果为基础的诠释的特色在较重视传统的象数学说；以科学精神为主体的诠释，重视历史考据方法，其近源为王国维（静安，1877-1927）“二重证据法”，远源可追溯至乾嘉学者蕴含科学精神的治学传统；第三种诠释类型“以思想观念为主线的诠释”，包含了衍生式的诠释、贯串式的诠释和整合式的诠释等三种。

以英文为主要语言的国际汉学界关于中国经典及其诠释的研究，在过去数十年来也累积了可观的成果。本书第七篇第一部分先回顾晚近英美学术界对于中国经典以及经典诠释传统的一些重要研究趋势。第二部分再以历史年代为序，简略介绍英美学界关于中国经典及思想史的研究著作。本文作者方克涛（Christopher Fraser）曾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博士后研究员，现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方克涛在回顾研究英文论著以后，以 Warring States Working Group（“战国经典研究组织”，英文简称“WSWG”）

① 皮锡瑞：《经学通论》（台北：河洛图书公司，1974年台景印初版），页1。

② 郑吉雄最近有新书论清代学术，见郑吉雄：《清儒名著评述》（台北：大安出版社，2001年）。

研究计划为例,提醒我们文本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先秦哲学原典不太可能皆出自某“大师”亲自所言或所作,而且我们亦不能预先假设原典具有任何统一而融贯的哲学主张。先秦原典甚可能系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由不同作者经年累月所发展而成。在这种情况下,设若诠释者预先假定先秦原典具有统一的哲学观点,并以重建此统一的哲学观点作为诠释的目标,则显然可能导出不完整、不融贯甚或过于简化之诠释。因此,为了充分掌握先秦诸子原典的丰富内涵,我们即必须将之视为收录许多短文之杂文集。由于此诸短文甚可能表达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主张,因此我们有必要尽量厘清此诸短文之写作年代及其理论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我们亦不能排除某些原典(如《论语》和《墨子》、《孟子》和《荀子》等)同时、并行写作之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不同学派在辩论后将其结论加注于原典中之可能。方克涛认为这种研究进路,应能对中国古典文献之形成历史、文献在先秦士人与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古代中国思想的演变,勾勒出较为清晰、完整的图像。方克涛所强调的文献研究法,主要是针对欧美汉学界趋新重于守旧的学风而发,他所强调的其实正是传统中国学人所重视并采取的研究方法。

本章第八篇论文作者李淑珍教授介绍韩德森(John B. Henderson)、范佐仁(Steven Van Zoeren)和葛德纳(Daniel K. Gardner)三位学者在中国经典诠释研究这个领域的新著,对于读者掌握最近的研究进展颇有助益。除了上述三位学者之外,最近韩德森有专书论宋明儒学、回教、犹太教以及早期基督教史上的“正统”与“异端”;^①周启荣、韩德森与伍安祖也合编一册论文集。^②此外,1996年10月10-12日美国Rutgers大学涂经诒教授召开“中国文化中的诠释学传统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会中所发表之论文并已编辑

① John B. Henderson, *The Construction of Orthodoxy and Heresy: Neo-Confucian, Islamic, Jewish, and Early Christian Patter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② Kai-wing Chow, On-cho Ng, John B. Henderson eds., *Imagining Boundaries: Changing Confucian Doctrines, Texts, and Hermeneutic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成书出版。^①为进一步拓展“中国文化经典的诠释传统”这个新领域,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张隆溪于1999年10月在香港召开“Canon and Commentary: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hinese Hermeneutic Traditio”国际会议。2001年1月12-13日,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阮新邦教授主办“哲学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研讨会;美国Rutgers大学涂经诒教授于2001年10月4-6日主办“Interpretatio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China: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Hermeneutics”,我自己最近也有新书论孟子学诠释传统,^②这些都是国际学术界最新的研究进展。本计划也每年在国内外各地办理中国经典诠释研讨会,拓展研究视野。除了台湾之外,大陆学者汤一介教授近年来提倡“中国解释学”不遗余力,^③董洪利教授也有专著,^④成中英^⑤及陈少明^⑥等教授也编著新书出版。

四

本书第二部分收录的四篇论文,都有心于从东亚儒家经典诠释传统中,探讨具有普遍意义与理论价值的问题。我在第九篇论文中建议以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之诠释作为研究的新策略点,由此迈向儒家诠释学的建构,并尝试解明具有东亚文化特色的思维方式之特征。本文也提出两种可能的研究

-
- ① Ching-i Tu, *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 1999).
- ② Chun-chieh Huang, *Mencian Hermeneutics: A 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s in China*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 ③ 汤一介:《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学人》第13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夏之卷;《关于僧肇注〈道德经〉问题——四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学术月刊》2000年第7期。
- ④ 董洪利:《古籍的阐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
- ⑤ 成中英编:《本体与诠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 ⑥ 陈少明编:《经典与解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方法:“概念史”研究方法与“思想史”研究方法,前者着重经典诠释的“语言性”,后者重视解经者的“脉络性”,并进一步从儒学的地域性以及儒家经典内部的问题意识等两个角度,提出若干可能的研究方向。

第十篇论文的主旨在于分析东亚儒学经典诠释史所蕴藏的一个方法论问题:经典以及经典的解释者都是特定时空的产物,各有其“历史性”。为了有效地解释经典,经典解释者是否必须经过解构自己的“历史性”才能进入经典的思想世界?何以故?这个问题既具有东亚儒学的特殊性,又具有诠释学的普遍意涵。这篇论文扣紧这个问题,以《论语》与《孟子》等儒学经典的解释为例,探讨经典诠释者与经典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儒家经典诠释学是一种体验之学,诠释者与经典之间构成“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之关系。经典解释者的“历史性”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是开发经典中之潜藏涵义的动力。但是,解释者的“历史性”却又是一把“两刃之剑”,它常常也会扭曲经典之意涵。因此,如何适当安顿解释者的“历史性”就成为一个方法论问题。我们认为,解经者固然不应也不可能完全解消自己的“历史性”,而以一个“空白主体”的姿态进入经典的世界;但也不可过度膨胀解经者的“历史性”,以致流于以今释古,刑求古人。因此,解经者必须在完全解消自己的“历史性”与过度膨胀自己的“历史性”之间,获致一个动态的平衡。

本书第十二篇论文则企图为中国解经传统中所谓“汉学”与“宋学”之争进一新解。这篇论文指出:在儒家经典中,具体性的历史事实(特别是圣贤典范人物的行谊)之叙述,与抽象性的普遍理则(如“道”或“理”)之证立,两者之间密切结合,有其互相渗透性,故儒家经典中所见的“普遍性”,实系一种“具体的普遍性”。在儒家经典中,历史叙述通常是一种手段,而以建立抽象的普遍理则为其目的。在儒家经典诠释史中的两种解经方法,一是诉诸个人生命之学思体验,而使经典诠释学成为一种“体验的学问”;一是企图经由名物制度,或文字训诂的解明,以确认经典中的“道”之原始的或真实的意义,将经典诠释学转化为训诂学。这两种解经方法各有所见亦各有所蔽,我们认为:在儒家经典中,历史叙述与普遍理则之间实有其互相渗透性。

本书第十一篇论文作者北京市社科院哲学所的洪汉鼎教授,是海内外